

内 容 提 要

这是多辑集《中华掌故类编》的第三辑。它收录了我国先秦至民国历史文献和各种文史材料中的掌故八百六十一则，进行分类整理，各类中收编的掌故，依照掌故原文的历史顺序排列。所录掌故史料翔实、情节生动，具有思想性、哲理性和知识性并用规范的现代汉语直译，语言准确流畅，具有可读性。这是一部兼有工具书作用和学术参考价值的雅俗共赏的知识性类书，适用于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它将给读者提供多方面的和多样化的知性借鉴，有助于多角度地了解历史，从而更好地认识今天，改造和建设今天。同时，就学习文史知识和古代汉语而言，它也堪称良师益友。

中华掌故类编（古文今译）

（第三辑）

朱祖延 张金煌 主编

责任编辑 刘彦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32.75印张 617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7—215—00712—X/Z·31

定价 14.90元

本辑撰稿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立平	王齐洲	王知久	牛葆宁	卢盛品
冯瑞生	刘先云	刘尚林	刘隆凯	许国经
孙开焕	孙天赦	李书汉	李培坤	杨昶
杨俊文	吴国胜	宋顺元	张占宗	张金煌
张锦江	陈彩琴	邵华	欧阳洲	易长发
易锦海	郑仁	单长江	孟祥荣	赵令则
桂玉胜	顾久幸	倪政文	徐全廉	高琦
郭康松	郭超焱	资寿林	萧方荣	彭益林
喻斌	程国政	鲁丰	鲁开泰	曾家秀
谭子好	戴德骥			

出版说明

掌故，是我国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在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掌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掌故向来以其丰富的文史知识，发人深思的深刻哲理，引人入胜的生动故事，受到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广泛运用。我们编纂、出版《中华掌故类编》一书，目的在于对我国自先秦至民国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其他文史材料中的掌故，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科学整理，力求使之成为一部集大成的掌故类书，以便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积累上尽绵薄之力，并给广大读者提供多方面的和多样化的知识借鉴。这是一部适用于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的雅俗共赏的知识性类书，兼有工具书的作用和学术性的价值。

本书由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负责编纂，由所长朱祖延教授和张金煌副教授任主编，约请数十位长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及其他文史工作的学有专长的同志撰稿。

《中华掌故类编》全套书约收掌故五千余则，三百余万字，分多辑出版，预计三年内出齐。本书为第三辑。限于水平和经验的不足，其中存在的问题，乃至错误，在所难免。

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史方面的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工作，以提高《中华掌故类编》的质量。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9月

凡 例

一、本书将辑录我国先秦至民国的历史文献和其他有关文史材料中的掌故五千余则，三百余万字，分六辑出版。第三辑收录掌故八百六十一则。

二、本书以义类为单位进行整理。共分七大类，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一）政事类：分有为政、教化、邦交、执法、荐任、待士、谏诤、赏罚、廉官、污吏、昏庸、民变、兴亡等；（二）家事类：分有训海、事亲、夫妇、兄弟等；（三）德行类：分有忠直、节烈、任侠、放诞、宽容、诚伪、谦傲、俭侈、贪鄙、趋附、谗陷、残忍等；（四）处世类：分有识见、器量、辨惑、时势、疑断、智愚、偏见、褊急、恩仇、得失、交往、俊辩、悔悟等；（五）事业类：分有立志、求知、功名等；（六）战伐类：分有备战、士气、纪律、攻守、计谋、救援、官兵、敌我、胜负等；（七）杂俎类：分有哲理、诙谐、才艺、怪异、轶事、民俗等。每辑均以类目收编掌故。

三、本书掌故按“通史”体辑录。每辑均包含选自先秦至民国的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献和其他有关文史材料中的掌

故，不采取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断代”辑录。每辑各小类的掌故均按原文出处的先后顺序排列。

四、原文中的难字注直音，疑难词句用夹注的形式略作诠释，对某些脱字、误字和衍字，作必要的校勘说明。

五、本书一律用规范的简化字。但在可能发生歧义，须用繁体字或异体字时，则在夹注中加以说明。

六、译文中的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序 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前人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文史材料。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中国人来说，以拥有这些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感到自豪，是理所当然的。发掘和整理这些遗产，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几年来，由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和关心，这项工作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的；一批又一批的古籍整理成果已相继面世，或即将付梓，成绩斐然。但是，对于保存在我国浩瀚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文史材料中的大量掌故，却还欠缺比较系统的整理。现在，我们奉献于读者的这部《中华掌故类编》，就是我们对这项工作的一种尝试。本书将从我国先秦至民国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文史材料中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发掘其中一切属于掌故的材料，进行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力求使之成为一部可以称之为集大成者的《中华掌故类编》。

“掌故”本是汉代的一种官职。汉文帝时，任掌故之职的晁错，被派往旧秦王朝的九十多岁的老博士伏生处，学习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典籍《尚书》。

掌故一职是干什么的呢？据《史记·晁错传》中斐骊集解引应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这里的“故事”就是指先列，即旧制旧例，先朝或本朝过去的典章制度，掌故的职责就是掌管国家的典章制度，包括宗庙礼仪等。《史记·龟策列传》：“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才置左右。”《史记》说的“因袭掌故”，与《汉书》的“循故事”，完全是一个意思：掌故即故事。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就是将这两个词进行互训的。正由于掌故是掌管典章制度的，因此后来也有称掌故为典故的。《中文大辞典》就是用“故事”既训“掌故”，又训“典故”的。

后来，“掌故”一词的含义有了一些变化，多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实或传说。而“典故”的内涵和外延则较“掌故”为宽，除了可以包括“典制和掌故”外，还包含有“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参见《辞海》、《辞源》）这样的内容。

被人们称之为掌故的材料（典故也一样），大都不是独立成篇的，一般也不具有文章学意义上的那种结构形式。它

只是附丽于浩瀚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文史材料之中，前者借助于后者的躯体而存在，后者是前者的载体。正如珍珠借助于贝类的躯壳而存在，贝类是珍珠的载体一样。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整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整理”。本书就是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文史材料中爬罗剔抉，钩沉辑佚，把其中属于掌故的材料发掘出来，加以今译和必要的注释而整理成书的。发掘掌故就象采珠工人从贝类的躯体中剥离出珍珠一样；而对掌故的分类整理，则又如同首饰匠人把珍珠刮垢磨光后用丝线连缀成项练等饰物一般。

掌故一般都具有情节性。一则掌故往往就是一段具有基本情节的故事，可以大体上见出某一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从而受到读者的喜爱。请读下面选自《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掌故：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即鸡蛋），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不止，乃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纳）口中，齧破即吐之。（《世说新语·忿狷》）

严格说来，这段记述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但却写出了王蓝田食鸡子的“以箸刺之”，“举以掷之”，“下地”，“以屐齿碾之”，“复于地取内（纳）口中”，“齧破即吐之”等一系列表现出他褊狭急躁性格的富有个性化动作，还配以“大怒”和“瞋甚”的典型化情绪，表现出了他

的性格特征，情节生动，形象鲜明。在这一点上来说，这篇仅四十五字的掌故简直具有现代小说的某些特征，而且语言生动活泼，极富表现力，令人为之捧腹，而又余味无穷，堪称掌故中的精品。

可以说，情节性是掌故的最基本的属性。没有情节性便没有掌故。例如：

孟浩然眉毫尽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至走入醋瓮；皆苦吟者也。（唐·冯贽《云仙杂记·苦吟》）

这里说的是唐代三位诗人苦吟的结果，却没有苦吟的情节，没有向读者展现出情节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没有情节，因此也就没有故事。象这样的材料我们没有作为掌故辑录。它可以在诗文中作为典故引证，但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掌故。当然，有些典故也具有情节性，具有情节性的典故实际上与掌故无异。典故可以是有情节的，也可以是无情节的，有的只是一条语言材料（如上面的《苦吟》），甚至是一个“有来历出处的词语”。根据我们对于掌故的理解，掌故必须是有情节的。典故可以包括掌故，但不完全等于掌故。这也就是本书的编纂原则和选材标准。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率更令（率更令：官名。唐代的率更令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令。率，读律。漏刻，古计时器，即漏壶）欧阳询（唐代书法家），行见古碑，索靖（晋代书法家）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

旁，三日而后去（《隋唐嘉话》中）

这个掌故虽然故事性不是很强，也不十分生动，但它的情节性是不容怀疑的，它清晰地展示了情节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一）欧阳询“行见古碑”；（二）“驻马观之”，很久才离开；（三）走了数百步后，又转回去，“下马伫立”；（四）看累了还要铺块毛毯坐观；（五）干脆睡在碑旁；（六）三日后才离开。情节的发生——发展——结局，脉络十分清楚，具有动感，与前面的《苦吟》只有一个静止的结论而无发生、发展着的情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除了情节性这一基本特征外，掌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性或哲理性，从中可以见出前人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能给人以启迪。有的掌故虽然并不具有思想性或哲理性，但却具有知识性，能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知识借鉴。如“杂俎类”的大部分掌故即是。

掌故当然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历史文献和一切文史著作作为材料来源。笔记和笔记小说亦可作为选材范围。但对于其中的鬼神和怪异材料，必须具有知识性与哲理性方可选用，如关于民俗、节令的某些掌故以及具有讽谕意义的人鬼、怪异故事等。但即使是这样的人鬼、怪异故事，也必须是以真实的或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为中心。如选自《汉书》中的刘邦道斩白蛇和选自《明史》中的朱元璋降生时满屋红光的故事，虽不免有些荒诞，但却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中心、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反映了前人对于历史和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一种认识和评价。对于那些不是以真实的或

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为中心、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据的纯神话与鬼神、怪诞故事，包括寓言在内，一般不作为掌故辑录。

二

分类，是掌故整理工作的重要一环。给掌故进行适当的合理的分类，使散见于历史文献和大量文史材料中的互不相属的掌故，分别统属于一定的类目之下，不仅便于检索，而且可以从同类掌故中得到大量的具有借鉴意义的材料。同时，因为这些掌故是按历史顺序排列的，从中还可能见出某些带规律性的特征，使得这些掌故从而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有了适当的、合理的类目，将能更好地引导和规范掌故的选材与整理工作。

但是，应该怎样分类才算是适当的、合理的呢？这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至少有两条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一，必须以掌故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作为建类的主要依据；第二，必须体现古为今用的原则，使得这些古代掌故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工具。整理者具有这样的现代意识，就会赋予这些古代掌故以新的生命，使它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感，从而使这些掌故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能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本书分为政事、家事、德行、处世、事业、战伐和杂俎等七个大类和若干小类。选材以义类为单位，即一个掌故只包含一个意义单元的思想内容。比如脍炙人口的《左传》名

篇之一《曹刿论战》一文，我们是把它划分为两个掌故，分别隶属于“战伐类”中的“备战”和“士气”两个小类，分别用了《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和《一鼓作气》两个题目。有同志曾对此提出异义，以为割裂了名篇。但我们认为，掌故和具有完整的文章学意义上的篇章结构的文章毕竟是有区别的，已如前述。既然我们的整理工作是以义类为单位，就应当严格按义类划分，一直划分到不可再划分的最小单位为止。《曹刿论战》既然“论”的是战争的准备和将士的士气两个问题，那么把它划分成两个单位，让它分别统属于“备战”和“士气”两个类目之下，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又如：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告又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宋史·包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351页。）

象这样一篇两百余字的材料，似乎已经很短了，撰稿人将它作为一则掌故。但以义类为单位，显然应当划分为三个掌故（如斜线所示）才算合理。这三个掌故的题目及其所归属的类目分别如下：

(一)包拯辞官事双亲(家事类·事亲)

(二)割牛舌者服罪(政事类·执法)

(三)岁满不持一砚归(政事类·廉官)

以上三则掌故不仅可以独立成篇,符合我们的选材原则和建类要求;而且只有这样划分才使掌故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具有针对性,更好地体现了古为今用的原则。

有些材料在典籍、文献中被分成两节,但根据材料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自成一个单元,不可分割。如《晏子使楚》这一人们所熟知的掌故,包括了三个故事:(一)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二)楚灵王嘲笑晏子其貌不扬;(三)楚王指盗者为齐人欲辱晏子,反为晏子所辱。这三个故事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六》中分属于第九、第十两节,可能是关于晏子两次使楚的记述。晏子面对楚人的侮辱,机智巧辩,反使楚王自己受辱,从而维护了齐国的尊严。这三件事相互关联,集中地表现了“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的总的主题,向来是作为一个故事来处理的。根据约定俗成和本书的分类原则,似以不分开为好,于是仍袭用了《晏子使楚》的旧题,将它归入“处世·智愚”类中。

三

关于注释和今译。

《中华掌故类编》是一部适用于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读者的、雅俗共赏的知识性读物,同时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鉴于这些掌故选自古代的文献、典籍，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已很久远或比较久远，对于年青的读者和缺乏古文基础的读者来说，文字障碍肯定是不小的。因此我们将这些掌故一律加以今译，力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进行表述。

我们的老一辈的翻译家，当年在翻译外国著作时曾经提出过“信”、“达”、“雅”的原则，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我们以为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古文今译。所谓“信”，就是要求忠实于原文，不走样。因为本书属于古籍整理，不用意译，而用直译。原文中的字、词、句都必须在译文中有着落，译文中一般不增添原文中所没有的东西。如果在译文中有必要出现原文中所没有的语言材料，则加上括号。译文力戒随意性。“达”，是要求文从字顺，文理畅达，无佶屈聱牙、拖泥带水之病。“雅”，是要求译文在“信”，“达”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文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为了满足某些读者阅读和利用原文的需要，我们将原文附于译文之后。对原文中的少量难读的字注了直音，对少数比较生僻的词作了一些必要的夹注。

我国古籍在长时间的流传中，版本较多，异文不少。我们一般采用比较通行的或经过点校的本子，采善而从之，并作了适当的校勘说明。原文后详细注明出处，以供某些有特殊需要的读者检索。

四

掌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精萃部分。它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形式短小精悍，语言生动活泼。掌故向来以其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丰富的文史知识，发人深思的深刻哲理，引人入胜的生动故事，赢得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不是偶然的。在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掌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华掌故类编》的出版，将给广大读者提供多方面的和多样化的知识借鉴。

历史是一面镜子。掌故里所反映的古代人民的社会生活、文化风尚和所体现的思想、哲理，将有助于我们通过认识历史，从而更好地认识今天，改造和建设今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人的经验，包括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借鉴。有这种借鉴和没有这种借鉴是大不一样的。

古代掌故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它适用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经过分类整理以后，将进一步提高它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的各类读者的不同需求。在这方面，《中华掌故类编》将充分发挥它的作为工具书的作用。它的分类，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人文科学各类课题所需要的材料，大体上可以从有关的类目中找到，或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掌故历来是论辩者用以说理和进行论证的材料，尤其是杂文写作者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鲁迅先生的杂文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我们今天难以企及的典范，固然主要取决于作为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先生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的洞察力和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但对于古代文史知识的丰富积累，能十分娴熟而得心应手地运用历史掌故，也正是他的杂文的一大特色。著名历史学家和学者邓拓的杂文，也明显地呈现出这种特征。今天，散见于报刊上的杂文，几乎没有不用掌故的。杂文须有一点“书卷气”或“学者气”，已成为今天杂文写作者孜孜以求的一种风尚。

掌故同时还是成语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如“一鼓作气”、“指鹿为马”、“毛遂自荐”、“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破镜重圆”、“四面楚歌”、“破釜沉舟”、“唾面自干”等等成语，都是来自掌故的。因此，掌故又是运用和研究成语的重要材料。

掌故的实用价值当然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如前所述，我们将从中得到多方面和多样化的借鉴。甚至同一掌故，由于我们所取的角度不同，它给予我们的借鉴意义也因此而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请读选自《孔子家语·在厄》中的一则掌故（为使一般读者都能读懂，下面只引译文）。

孔子不偏听偏信

孔子被围困在陈蔡。跟随他的人七天没有吃东